

元宇宙与媒体秩序和文明秩序^[*]

龚伟亮

(中国传媒大学 传播研究院,北京 100024)

[摘要]元宇宙是媒介发展的远景,作为“一种深度媒介化的终极形态”推动了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关系反转:虚拟世界摆脱了作为人的复制品、作为另一个平行的宇宙的地位,成为第一宇宙、高维宇宙,线下世界/链下世界的“我”成为肉身的剩余。延伸为一种人类文明路线和文明秩序想象的元宇宙构想中包含“天堂与地狱的合一,永生与永死的翻转,自由与奴役的辩证”等多重悖论,并在脸书改名事件中有着多重表达。扎克伯格的“帝国野望”昭示了“元宇宙”的历史悖反,如果没有对于应用技术背后具体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批判性反思,元宇宙这一本来“指向了人类更高级的自由”的技术期待和文明形态,几乎必然要在资本和市场主导下走向扭曲,沦为一种可以称之为“宇宙资本主义”的压迫性体制。作为一种文明秩序,元宇宙基于对人类非物质和生命政治生产的全面囊括,将导致人的自主奴役局面,并孕育新的反压迫斗争。在发展愿景上,元宇宙应在国家公共性机制的纠偏下,走向帮助人类建设更有意义的教育和实现更有意义的生活以及实现真正“自由王国”的前途。

[关键词]元宇宙;媒介;文明秩序;宇宙资本主义;自由王国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2.09.006

一、引子:刘慈欣的“摇摆”

作为中国科幻文学标志性人物,刘慈欣对待“元宇宙”的态度令人玩味。

一方面,他在光芒四射的科幻史诗《三体》中,就描述了类似“元宇宙”的VR三体游戏;在其更早写作的《中国2185》中,他对于建立一个独立于现实世界的网络虚拟空间的想象,同样可视作前网络时代里的“元宇宙”构想——这个未

来世界的虚拟空间的打造,是为了让依靠营养液和氧气瓶维持生命的垂垂老矣的人类通过“意识移民”,在这片爱丽丝乐园里永享快乐;此外,《时间移民》对于由量子芯片和超级电脑构建的“无形世界”的描述(“您可以真正随心所欲,创造您想要的一切。您可以创造一个有千亿万人口的帝国,在那里您是国王”),《不能共存的节日》对于“虚拟世界”的描述(“在那里人什么都可以做,想什么就有什么,像上帝一样。在那里一个

作者简介:龚伟亮,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传播政治经济学、技术传播。

[*]本文系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基地项目“网络·传播与民主迷思:对传播资本主义的批判性阐释”(2017009)的阶段性成果。

人可以拥有整个星球”)等刘氏作品中所展示的“大尺度未来幻想”,与我们今天热议的“元宇宙”几乎就是同形同构的。

在此意义上,视刘慈欣为中国第一位“元宇宙架构师”并不为过。“元宇宙”的元素的确在他的作品中一再作为人类进化的方向或文明的归宿得到呈现和探讨,间或获得一定程度的肯定。

但另一方面,在刘慈欣的文学创作和公共表达中又多次出现对“元宇宙”这一文明愿景的省思和批评。在近年的公开演讲中,他曾称“元宇宙将引导人类走向死路”,开炮和怒批的意味十足,其逻辑在于元宇宙是极具诱惑、高度致幻的“精神鸦片”,“人类的未来,要么是走向星际文明,要么就是常年沉迷在VR的虚拟世界中。如果人类在走向太空文明以前就实现了高度逼真的VR世界,这将是一场灾难。”

在短篇科幻《不能共存的节日》中,通过再明显不过的嘲讽口吻,刘慈欣的这一立场也获得了清晰表达。他这样描绘未来世界:

未来的虚拟世界确实是天堂,在那里每个人确实是上帝,其美妙是任何想象都难以企及的。我只想象一下那时的现实世界。开始,现实中的人会越来越少,虚拟天堂那么好,……都争相上载自己。地球渐渐变成人烟稀少的地方,最后,现实中一个人都没有了,世界回到人类出现前的样子,森林和植被覆盖着一切,大群的野生动物在自由地漫游和飞翔……只是在某个大陆的某个角落,有一个深深的地下室,其中运行着一台大电脑,电脑中生活着几百亿虚拟人类。

在刘慈欣看来,看似“天堂”的美好乐园,不过是人类沉溺“颅内高潮”的可怜倒退,虚拟世界的温柔乡,意味着人类开拓疆域的脚步停止和人类文明的熄灭。

相对于“元宇宙”的幻境,璀璨的星辰大海(“太空宇宙”)才是人类文明应该朝向的方向。刘慈欣把星际文明和“太空宇宙”置于远超“元宇宙”的价值优越地位,作为一名心向太空的技

术主义者,其道不孤——登月者巴斯·奥尔德林“你允诺我殖民火星,但却给我脸书”的著名吐槽,与刘慈欣称“元宇宙”将成为“一场灾难”的批判有着同样的“飞船派”底色。

刘慈欣对“元宇宙”的忧思是有人文意涵的,但这种人文思考在他的科幻作品中往往呈现一种“摇摆”的状态:对于科技扩张来说,人文尊严既像最后稻草,又似螳臂当车。在刘慈欣的小说《诗云》里,面对外星文明的全方位碾压,为人类保全最后一丝尊严以至于让吞食者帝国的使者“大牙”发出“人类智慧生命的精华和本质,真的是技术所无法触及的吗?”之叹的,是诗歌。如果说诗歌和艺术代表了刘慈欣内心深处一种深刻的人文情愫和期待,是对比拼算力和算法的时代里的人文尊严的最后坚守,那么同样出自刘慈欣之手的《作品28610号》和《作品第46号》里出现的机器诗人和人工智能诗作,就在两可的摇摆间显出一种有关“艺术与机器”的深刻吊诡。

同样的,刘慈欣笔下“元宇宙”这种内向的文明进路,既是人类“自寻死路”,又因为对一个看似“美好”世界的创造,而不可避免要在与“现实”的竞争中最终成为“现实”——“虽然可以在两个世界都有一份大脑的拷贝,但无形世界的生活如毒品一样,一旦经历过那生活,谁也无法再回到有形世界里来,我们充满烦恼的世界对他们如同地狱一般”。(《时间移民》)

尽管语词严厉,但在刘慈欣对“元宇宙”的批判中仍能显出他的“一贯”的“摇摆”思路:为科技征服“不无自嘲”地设置一道“人文防火线”。从更深层讲,当刘慈欣以技术的内部视角来涵盖(或取消)政治经济视角,从而展开对人类未来的叙事和想象时,其对人类处境的关注往往陷入由于科学技术范畴的不自足而导向的某种“骑墙”和自相矛盾的状态。

但是“摇摆”或“两面”的刘慈欣在对“元宇宙”的架构和批判中,至少把基本命题抛出来了,不妨称之为“元宇宙”悖论:即它或是天堂与地狱的合一,永生与永死的翻转,自由与奴役的辩证。

本文着重从媒体秩序和文明秩序的角度,对于“元宇宙”这一现实议题和人类愿景展开讨论,力图对“元宇宙”悖论进行立足新闻传播和人文社科理论资源的批判性反思。

二、媒介演化与媒介秩序

作为互联网时代迄今为止有关人类社会文明愿景或许是最具蛊惑力的整合性表述,“元宇宙”包罗万象,但它的一个立基点却显在于媒介演化或媒介迭代。

知名文化研究学者戴锦华称“元宇宙”“这个词本身没有提供新东西,无外乎科幻写作的某种世界构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将原始岩画视为元宇宙的最早模型,认为它是借助最原始的媒介进行的想象性虚拟投射,包括之后的文学艺术也是元宇宙最早的载体;^[1]冰川思想库研究员任大刚称“自从人类诞生语言结绳记事开始,就通过想象、运算,以文学、艺术、诗歌和宗教、科学、数学等方式,构建了一个虚拟的、精神的世界”,“元宇宙”所体现的只是“基于互联网+AI+VR+AR+MR(互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构建虚拟场景的能力”的新的飞跃。^[2]

这是“元宇宙”这个火爆前沿概念所具有的“新”与“旧”的一体两面:它足够新潮酷炫,但根植的却是一脉悠远的人类对于“另一个世界”的想象和媒介化构建——“人们使用各种物质或方式(宗教、做梦、药物、走神等)获得虚拟体验有着悠久的历史,网络媒介和元宇宙可能只是其中最重要也最切近的一种。”^[3]我们甚至可以直接从媒介角度对“元宇宙”进行界定和把握:“元宇宙是一种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虚拟和现实融合的媒介及媒介化社会形态”。^[4]

元宇宙是媒介发展的远景,“以数字媒介演化史的视角看,它本就是人类传播发展的水到渠成”。作为“一种深度媒介化的终极形态”,它以最具整合性的方式回答了媒介要将人类带向哪里的问题。

媒介发展要把人类带往何处?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的结构化思考抽丝剥茧、一叶知秋。

虽说物理世界、现实世界结构复杂,但基本可以抽象为三层关系,第一层是时空关系,第二层是自我关系,第三层是社会关系。

在打破时空限制方面,媒介尤其电子媒介所起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最早的一个划时代的电子媒介发明其实是电报,从电报诞生之后,物理世界的时空才不再成为一个固态的定型化阻隔,开始出现与物理世界不同的“平行的宇宙”。^[5]美国传播学者彼得斯当年说道:

另一个平行的宇宙像变戏法一样地出现了;人的复制品栖居在这里,它们遵循的规律和血肉之躯遵循的规律迥然不同。……虽然蒸汽机动力使铁路和汽船的人货运输大大加快,然而人体还是跟不上快速的声觉、图像和视觉表现。我们的身体会疲劳,承受力有限,然而我们的形象一旦记录下来,就可以通过媒介而流通,没有什么确定的限制,且能够跨越空间和时间的荒园。^[6]

也就是沿着这条路线,从电报、电话、广播、电视一直到信息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虚拟现实技术,时空都变得瞬时化、同步化、同质化,这一“另一个平行的宇宙”的构建其实完成的是物理世界虚拟化的第一步。

脑机接口技术,表面上是在处理或改变人与机器的关系,实质上带来的是人与自我关系(在此具有传播学观念中“内在传播”的意味)的改变。硅基和碳基生物的深度融合(刘慈欣在《时间移民》中的警句是:“对很大一部分人来说,有机物已不是他们的主要组成部分了”)势必改变人类存在方式和自我认知的方式,它的发展引起的是人文主义的某种危机——因为人文主义的根基也就是人的独特性不复存在。^[7]这是第二步:人的生物性的虚拟化,或内在世界的虚拟化。

以区块链为代表的去中心化的新技术开启的是第三步,也就是人类社会关系的虚拟化。从货币的可编程(货币的本质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

社会关系),到金融—经济的可编程(借助智能合约),再到基于区块链的社会—治理可编程,^[8]是预计的发展路线。至此,如果我们的时空感和社会关系都要依赖于网上或链上来确立和维持,真实世界的自主性就会逐渐丧失,它和虚拟世界的关系将很可能发生反转。

这里预示的媒体秩序变迁,是随着这种关系“反转”或“逆转”,媒体逻辑也会与之相匹配,发生从工具客体到“去客体化”、去“中介物”的转变。媒介(客体)与人(主体)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任大刚在以“庄周梦蝶”作为隐喻“映射”“元宇宙”中的“物”“我”关系(也就是“客体”与“主体”之关系)时这样讲道:

这一代的虚拟场景,完全超越了文图时代,也超越了声光电时代。之前的两代虚拟场景,“我”可以明确地注意到“物”“我”两分,我是我,物是物;这一代虚拟场景中的“我”是我,现实场景中的“我”也是我,用庄周的话来说,就是“物我两忘”,我就是蝴蝶,蝴蝶就是我。^[9]

“物我两忘”也就是“主客混一”,再拆分来说,即“客体的主体化”和“主体的客体化”的纠缠态,其极致是“媒介”的消失。

以这一媒体秩序的未来视野观之,则这一必然走向“物我两忘”的虚拟世界的媒介进化的推进逻辑,一方面是“效率逻辑”(实质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逻辑),虚拟化带来效率,这一命题无论在理论还是历史上都令人难以质疑;另一方面是“快乐逻辑”,在无意义之“快乐”所产生的生理机制层面也可说成“多巴胺逻辑”,这其实也就是刘慈欣所说的“如毒品一样”“一旦经历过那生活,谁也无法再回到有形世界里来”的“无形世界”具有致命吸引力的原因所在。“元宇宙”是媒介快乐生产的登峰造极。以“快乐逻辑”嵌套“效率逻辑”,实现某个程度上的合二为一的表述,也就是“快乐的效率”的逻辑——亦即南开大学文学院周志强教授“痛快淋漓地把欲望实现的快感变成一个按钮就能完成的事情”^[10]之

语的真实含义,这是“元宇宙”这一智能媒介朝向“极乐幻境”进化进程的强大内在推力和隐含叙事线索。

因此,“元宇宙”在媒介叙事层面的意涵,表面上是伴随着“从用户到玩家,从信息传播到全息传播,从传播本体到体验本体”的转化,以及以“沉浸式和临场感”为全新传播交往特征而出现的“终极媒介化”形态,实质上却是自19世纪30年代电报的诞生以来,电子媒介构造的“另一个平行的宇宙”在看似确定无疑的媒体演化序列里成功“上位”为“超越宇宙”(“元宇宙”对译的metaverse本义即为“超越宇宙”)。作为一种“理想的连接”的“元宇宙”,基于对数字世界中生活、工作和娱乐的全新整合,极大拓展了人类生存维度并实质拥有“高维”特征(把意为“超越宇宙”的“metaverse”译为“元宇宙”,很可能是受到日本动漫文化的影响,这里的“元”也隐含一种虚拟空间“维度提升”的叙事)。

与“元宇宙”的虚拟世界“升维”相对的,是现实宇宙的“降维”——也就是刘慈欣在《不能共存的节日》里一直忧心忡忡警示的:由于人可以在虚拟世界里成为享受极乐的“上帝”,因而“断开网络沉溺于现实是最让人不齿的懒惰和堕落”,用当代文化批评学者的理论化表述则是元宇宙“隐含着‘幻想的现实化’内涵,也可以导向真实现实的彻底虚渺化”,“人类完全可以把现实的生活看成是异化的、机械的与无聊的,而把虚拟技术所创生出来的故事化生活当成具有真情的、有机的、生动的生命经验之来源”。^[11]德布雷在《媒介学宣言》中曾经辛辣地讽刺道:“被媒介学当作理论问题来建立的东西,天赋观念论式的哲学派系却把它看作一个无聊的后勤问题。”^[12]面对“元宇宙”的高维整合,现实世界的肉体作为媒介的物质因素亦将成为乏味的背景和“无聊的后勤问题”。

总结而论,作为前沿媒介技术的集大成者,“元宇宙”这一“终极媒介化”形态使得虚拟世界摆脱了作为人的复制品、作为另一个平行的宇宙

的地位,最终“超越宇宙”,物理世界转而成为元宇宙的附属,元宇宙——正如这个译名所蕴含的:它是第一宇宙、高维宇宙——使“虚拟的成了现实,现实的成了虚拟”,元宇宙里的自我成为“真人”“真我”,线下世界/链下世界的“我”成为肉身的剩余——就如同在元宇宙讨论中一再被提及的电影《头号玩家》中所展示的那样,与虚拟游戏宇宙“绿洲”相比,所谓的“真实世界”不过是一个衰败不堪的、权且令以“无用阶级”为绝大多数的人们“存放肉体的世界”。

三、“自由—奴役”悖论与文明秩序

元宇宙既具有媒介进化的本来意义,又以一种合乎逻辑的方式溢出媒介范畴本身,进而延伸为一种人类文明路线和文明秩序想象。

在理论或者语义的层面(区别于现实层面的实体分析),元宇宙和文明秩序之间隔着的关键过渡桥梁就是“两个世界”。而“两个世界”的含义或意象,无论在本文的“引子”还是第二部分中都一再重复出现。如同15—17世纪地理大发现产生“新旧大陆”之别并进而冲击世界格局一样,人类对元宇宙的构建探索,在制造“新旧世界”的区分后,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两个世界”关系问题,以及推而广之的人类文明秩序问题。而且相比于地理大发现是在以欧洲为中心视野的地理空间的代数增量基础上产生出两种文明图景(海洋—贸易的西方文明与土地—农耕的东方文明)和法秩序变迁,^[13]元宇宙是以几何级维度叠加的方式对人类文明空间和文明样态的崭新开拓。从文明形态变动的剧烈程度上,未来元宇宙所带来的“新旧世界”的文明冲击或许更超过历史上“新旧大陆”对世界文明格局的影响,从而使得庄周梦蝶中对两个世界秩序的想象性质询和玄学梦呓,变成一个对有着日渐清晰文明所指的、可欲可求的文明秩序问题的对话与批判。

笔者在“引子”部分所言“元宇宙”悖论(即它或是天堂与地狱的合一,永生与永死的翻转,自由与奴役的辩证),在至此呼之欲出的“电子

极乐世界”这一“元宇宙”“译名”,以及前述“快乐的效率”逻辑面前,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有效揭橥。与此同时,这三个悖论基本上是由科幻小说生发出的关于人类在“元宇宙”生存状态的人文思考,在揭示人的生存状态上的“词与物”的分裂上,可以说是“三体合一”的(当然,类似的悖论表述并未穷尽)。这其中的“自由与奴役的辩证”,又可以从人文性的层面拓展到文化政治与文明秩序的层面,作为一个“破壁”的缺口承担与其他批判性思考——例如,国际知名批判学者和欧美激进左翼哲学家齐泽克称“元宇宙”是“企业新封建主义的幻象”,并有可能“将我们推向新的野蛮状态”^[14]——沟通的重任,从而将我们的讨论继续引向深入。

笔者在此姑且称之为元宇宙的“自由—奴役”悖论问题。基于此,继续展开下文讨论。

(一)“弦外之音”:“元宇宙悖论”的多重表达

尽管“元宇宙”作为概念提出要追溯到1992年尼尔·斯蒂芬森的科幻小说《雪崩》,但它在近30年后引发科技圈、资本圈超高关注甚至瞬息间成为“几乎覆盖了人文社会科学所有学科的热络话题”,主要是拜社交媒体巨头脸书改名Meta,扎克伯格宣布进军元宇宙这一热点事件的引爆效应所赐。

在舆论热议中,“改名事件”本身作为一个能指被用来进行各种投射。但就像全息论所主张的局部蕴含整体的所有信息一样,脸书“改名”事件本身也贮存着整个“元宇宙”物像的全部信息,对“改名”这个能指本身的弦外之音也可做有意味的阐释。

首先,“改名”的背景是脸书这个以媒介为名的“公权力”不断与旧秩序也就是民族国家秩序产生紧张。

相关的事件甚至“屡见不鲜”:2018年,脸书因为泄露用户信息被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罚款,扎克伯格前往美国国会接受质询,并以40次“不知道”的回答疑似试图回避问题;同年,因剑桥分析公司数据丑闻,扎克伯格接受欧洲议会质询,

潦草的回答引发议员不满,被质疑是“一个天才创造了一个数字怪兽摧毁了我们的社会和民主”;2019年脸书提出加密货币 Libra 计划,遭到美国政府阻止,胎死腹中;近年来被联邦贸易委员会两次提起反垄断诉讼,要求其进行拆分;2021年在与澳大利亚的冲突中,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批评“封杀”整个澳洲媒体和澳洲政府机构的脸书“既傲慢又令人失望”,警告科技巨头:“别以为世界由你们操纵!”而不满脸书权力的国家并非孤例,澳大利亚实则抢在欧盟、加拿大等之前,成了全球首个与脸书正面“硬刚”的政府……

脸书与民族国家秩序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用华盛顿邮报的话说: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脸书已经从一家被誉为美国创新的象征的公司变成了一个“技术作恶”的象征。这导致了全球范围内针对科技行业的立法和诉讼浪潮。^[15]

以之为背景,脸书进军元宇宙之举其实“是一个完全的政治动作”,^[16]准确地说,是一个披着商业转型外衣的政治动作。纽约大学斯特恩商业与人权中心副主任保罗·巴雷特批评当许多公司都在寻求与公共性机制和解之时,“马克·扎克伯格却将目光放在了元宇宙上。他似乎对当下大众的呼声没有任何反应。”^[17]

脸书“改名”事件,其实是借道元宇宙,摆脱公共性追问的压力,向着更宏阔的商业帝国愿景进发。对于来自民族国家秩序的公共性审问,这是一种“回应的不回应”和“不回应的回应”。

其次,“meta”是元宇宙英文名 metaverse 的前缀,根据演讲实录,扎克伯格自己是这样解释这一取名的:“我过去喜欢学习古典文学,‘meta’这个词来自希腊语,意思是‘超越’(beyond)。”“超越”不仅关联着扎克伯格自己的学习历史,也关联起脸书的创业史(“这是一个从寝室开始的故事,它的发展超越了我们的想象”),更关联起“元宇宙”的壮阔未来。在“脸书互联”(Facebook Connect)年会的高潮段落和剧终段落,扎克伯格在 53 秒的时长内重复了五次“超越”:

我们超越了今天的可能性,超越了屏幕

的限制,超越了距离和物理学的限制,走向了一个人人都能与对方同在、创造新机会、体验新事物的未来。这是一个超越任何一家公司的未来,它将由我们所有人共同创造。……如果这是你想看到的未来,那么我希望你能加入我们,因为未来将超越我们能想象的一切。

“超越”的确是我们理解扎氏元宇宙构想的关键词。《哲学分析》主编成素梅教授以“超越单一、追求整合性的应用,超越界面、增加空间感,超越静态、走向嵌入感,超越身体边界、增加时空的穿越感,超越现实、增加满足感等五个方面”^[18]来阐释“超越”这一元宇宙的核心之一。类似地,我们可以模仿扎克伯格的表达方式,用一连串“超越”来逼近扎氏“元宇宙”的愿景:超越脸书、超越现实、超越肉身、超越宇宙、超越国家……

可以说,“超越”既是“元宇宙”的命名,也是“元宇宙”最重要的修辞。而它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就如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刘梁剑教授所指出的:“一念发动处即是行,业意取消身业,没有身体和行动的‘此间乐’与其说是超越的自由,不如说是丧失人之本质的沉沦。”^[19]由是,笔者所言“元宇宙”“三大悖论”(以及还可以增添的其他近似的悖论表达),一言以蔽之的一个等价的表述,就是“超越悖论”:以超越为名,以超越为修辞,走向超越的反面。“元宇宙悖论”等于“超越悖论”。

“超越悖论”中还包含另一个侧面,即调用“超越”的修辞来收编、瓦解、扑杀任何不解风情的质疑和批判。北京师范大学教师陈亦水在《从反乌托邦到后乌托邦:元宇宙艺术及其数字资本的底层逻辑》中评论道:

讽刺的是,希腊经济学家瓦鲁法克斯曾指责扎克伯格盗用了“meta”一词,因为后者恰是一家反资本主义智库名字,顾问还包括著名哲学家乔姆斯基、电影导演肯·洛奇,以及学术明星齐泽克。反资本主义与数字资本主义竟共享同一种希腊词源,因而没有什么比一个反乌托邦旗帜却能成为乌托邦符号而

更具反乌托邦色彩的现实与未来。^[20]

这当然也是一种深刻的悖论性阐述。以乌托邦视角来审视元宇宙并不突兀——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刘擎教授视元宇宙设想为“一种作为解放乌托邦的前景”，^[21]有学者以“25号宇宙”这个著名的始于乌托邦终于反乌托邦的实验来类比元宇宙，从静态视角把元宇宙视为一个披着乌托邦外衣的反乌托邦（异曲同工的例子是美国学者吉尔·莱波认为元宇宙“是一种奢侈的资本主义形式，其灵感却来自于……控诉资本主义的故事”^[22]），是与前述的所有悖论性表达完全一致的。但陈亦水这里的深刻之处是在资本主义矛盾叙事中把静态悖论延展为一种类似双螺旋结构的立体悖论：数字资本主义借用“元宇宙”的宏大理想和超越修辞作为救赎方案，以逃离充满危机的反乌托邦，走向新的乌托邦，但走向的乌托邦仍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乌托邦。一个最为吊诡的总结或许是：一个反乌托邦形式的乌托邦，最终却只是一个乌托邦形式的反乌托邦。

在数字资本主义文化批评的角度上，以齐泽克的方式来表述，脸书改名事件作为一次“自我颠覆”正是“症状式”的资本主义的一个体现——它总是假装实现了伟大的意义，却潜在地回归那个游移不定的，令既定的语言、符号、话语和形象都失效的“某物”的召唤。^[23]

再次，在评价脸书试图拥抱的“元宇宙”战略时，很多人不约而同的评价是“酷”。“在剑桥分析公司引发隐私争议、发行虚拟货币 Lebra 折戟之后，脸书急需炒作一个能避开监管的新概念”，此时，“‘元宇宙’是个再合适不过的概念”：一方面，元宇宙足够“高科技”，兑现时间较长。这能给脸书争取到足够的时间逃离公众的批评，同时也会让社会公众认为其“画饼”也是情有可原。另一方面，元宇宙足够“酷”，足以获得更多消费者和用户的青睐，也能博取政府的同情。^[24]

前卫的“高科技”噱头为这一战略提供了蛊惑性的号召力和长时段掩护，而足够“酷”又充

分激发了文化上的想象力。这里应当注意，尽管“酷”（Cool）是一个全球性的流行文化语汇，但基于新自由主义的文化与经济、政治的不可分割（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同时贯穿于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和政治疆域），其本身也暗含了资本主义的文化秘密乃至全部秘密——在这个角度上，刘慈欣“元宇宙”作品里略显老套的“无形世界”和“IT天堂”就很不“资本主义”。

英国拉夫堡大学社会科学系文化分析教授吉姆·麦圭根面对一种“‘酷’已经从左翼到右翼横贯了政治版图”的当代景观，以“酷资本主义”（Cool Capitalism）来指称资本主义本身对“自我陶醉、嘲讽式的事不关己、崇尚享乐”的文化特征和文化表达的收编，以说明当代资本主义是如何建构一种适应力强劲的大众合法性，“这种合法性越出意识形态和宣传管理范畴，进入日常生活的肌理和常识”。^[25]吉姆·麦圭根借用戈夫曼戏剧理论里的概念，解析道：

在戈夫曼看来，是“台前区域”（front region）以其具诱惑力的高品位吸引着广大民众，无论是相对富裕的群体，甚或有抱负的穷人。可是，同样存在着一个“台后区域”（back region），它更像一个卫生和安全无法达标的有着肮脏秘密的工业化厨房。这个台后区域偶尔被瞥见，并引发质疑食物供应的担忧性言论。如同在任何一家好饭馆，餐厅总管必定会想法子安抚顾客，要不然他们可能会光顾其他地方。也许有个脏厨房很“酷”，反正要煎个蛋饼就得打碎鸡蛋，而有时，鸡蛋就掉到老鼠晃荡的地板上。^[26]

沿着这一表达方式，“酷”炫的“元宇宙”在刘慈欣科幻小说里以“上帝”和“天堂”为“台前区域”以“毒品”和“堕落”为“台后区域”，在《雪崩》里以“狂欢作乐”为“台前区域”以“暗黑秩序”为“台后区域”，在《头号玩家》里以“予取予求”为“台前区域”以“潦倒绝望”为“台后区域”……

“台前”和“台后”，就是“一面”和“另一面”，也就是悖论的一体两面。也即是说，无论从

“词”还是“物”，从“末”还是“本”上辨认，“元宇宙”这本“天书”的字里行间横竖都会露出两个字：“悖论”。“元宇宙”就是一个浑身长满“悖论”的科技想象、文化表达和秩序构建。

（二）“帝国野望”与“元宇宙”的历史悖反

脸书的“元宇宙”转型，包含两层脱钩：一层是企业名称与最近陷入麻烦的社交网络平台脸书脱钩，凸显出公司专注于转向以虚拟现实为主的新兴计算平台，另一层更实质的意图是超越民族国家或与民族国家体制脱钩，把媒体公权力真正兑现为“国家”治理。

这并非比喻或修辞的说法。美国权威杂志《大西洋月刊》执行主编阿德里安娜·拉弗朗斯一篇题为《地球上最大的专制“国度”》的文章，清晰洞见了脸书披着媒体外衣的“公权力之实”：

脸书与其说是个网络出版商、社交平台、公司或程序，不如说是一个“国家”。在进入“元宇宙”之后，物理意义上的土地已经不再重要；脸书已经开始尝试发行自己的货币；扎克伯格一直坚持以“治理”的逻辑和理念，来管理平台并塑造自身形象，甚至尝试建立类似立法机关的下属机构；而29亿用户在他口中也以“公民”的形象存在，并对彼此的聚合有着明确的想象。从各种意义上看，它都更符合“国家”的定义。^[27]

当这个实质的“公权力”拥有“土地、货币、治理哲学和人民”，并以“治理”手腕不断觊觎和挑战国家时，一再将自己塑造成脸书国家领袖的扎克伯格曾经的口头禅“公司胜于国家”“就具有更黑暗的含义”，无怪乎像希拉里·克林顿那样的传统政治精英敏锐地“总能从扎克伯格身上嗅到一丝威权主义的气息”。^[28]

超越民族国家，成为真正拥有治权乃至主权的、以“元宇宙”为酷炫命名的新政治经济文化架构的权力枢纽，这是扎氏的“帝国野望”。

把关注中心从脸书转移到“闻鸡起舞”的全球科技和资本世界，则“环球同此凉热”的“元宇宙”大戏，实则是一种新政治经济文化秩序建构

的序幕，这种新秩序以区块链和 web 3.0 为重要基础设施，包含新的经济秩序、新的政治秩序和新的文化秩序——如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杜骏飞教授所说：“元宇宙与 web 3 这两种技术潮流，均以区块链为公约数，这很可能意味着人类将进入新的精神世界，在那里，有充满抵抗性的文化，有自愿缔约的 DAO 式政治，也有 DeFi 为代表的去媒介化经济形态。”^[29]——总而言之，这种“新的精神世界”就是一种新的文明秩序。

从理想的技术期待的角度讲，元宇宙的经济秩序，是依托区块链和智能合约打造去中心化的新结算平台，保障价值的传递、流转和归属，建立稳定、高效透明、确定性强的经济系统以支持人们在元宇宙中的消费需求；元宇宙的政治秩序，应当是与元宇宙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去中心化的自治形式，是保持理性、平等、开放、承载公共价值并具有高度互动性的公共领域的遍地开花；元宇宙的文化秩序，是自由、丰富、快乐、个性、高度无拘束的交往文化和参与文化，以及弱者得到技术赋权后的“天下大同”……

这种文明秩序意味着一种值得期待的“道德愿景”在元宇宙时代的涌现。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曹刚教授构想的：

元宇宙是互联网的理想形态，其本质是更好的连接，也就是“去中心化”的连接。这种连接更能满足人性的根本需要，即在更广泛和多样的连接关系中实现更高的自主性。“去中心化连接”具有开放性、具象性、直接性三个特点。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去中心化的连接不只是一个可以预期的事实，还是一种具有普惠性的共同善。但这种去中心化的连接不能自发实现，需要人类社会自觉意识到其共同善的性质，并通过道德规范及其他社会规范来维持、促进和发展这样一种共同善。以此为依据，元宇宙的基本道德原则既不是个人主义的，也不是集体主义的，而是以连接为本位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元宇宙的基本正义形态也将由交换正义取代分配正

义,元宇宙的底线伦理,如信任、互惠、参与等,也将通过技术化的方式嵌入到元宇宙的底层架构之中,从而具有程序伦理的特征。^[30]

这些技术期许本来是合理的、是“善”的,但就像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达拉斯·斯迈思在20世纪70年代就郑重向我们发出的警示一样:技术是非中立的,它从来不是独立和自主的存在。从技术研发到应用,是一个政治的过程,即社会权力参与其中为实现自身的意图展开斗争的过程;技术既非现代化社会问题的“替罪羊”,亦非解决问题的“万灵药”。真正原因是应用技术背后具体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31]

由是,站在批判传播学角度非常清晰的理路就在于:如果没有“对资本主义技术路线及与之互构的政经关系”的批判,^[32]不仅无法分析、预见技术的社会后果,无法兑现技术的民主潜能和道德潜能,还会使所有“美丽新世界”的技术幻想或构想,都成为引君入瓮的诱饵和陷阱,甚至陷入一种偏执的技术狂热、技术天真,有意无意成为狂癫的技术邪恶的一部分。

没有这种批判性反思的视角和高度,元宇宙这一象征“拯救”的“弥赛亚”、这一本来“指向了人类更高级的自由”的技术期待和文明形态,几乎必然要在资本和市场主导下走向扭曲——“在资本秩序主导的世界里,技术是更好的鸦片、更锋利的镰刀、更具效率的蜂巢”^[33]——从而背离原本的潜能而走向其反面——包括经济秩序上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政治秩序上的资本高度专制以及文化秩序上的空虚混乱、醉生梦死,互联网学者胡延平的“盛世危言”在某些方面与此吻合:“要看清元宇宙的现实。现实是我们最不希望发生的,最后都会发生。我们最不希望走形或者变样,最后一定会走形,一定会变样。我们最不希望背后被少数人操纵,一定会被少数人操纵。我们最不希望最后连个体验的问题都没解决,最后真的体验比互联网更加退步。”^[34]

由是,合乎逻辑地,“元宇宙”将由一种静态的或自身结构性的悖论,走向现实的和历史的悖

论:它一边集合所有的未来新世界的美丽修辞和自由旗号,一边倒退为齐泽克所言的走向公共空间私有化的“企业新封建主义”,^[35]走向一种新型专制、新型异化和新型奴役的状态。

(三)“宇宙资本主义”

“元宇宙”昭示的悖反性的文明秩序构建逻辑,显然是类似于“新殖民主义”的商业资本扩张叙事。

在资本的现实逻辑层面,一方面,尽管有疫情强化了人的线上生存和虚拟交互体验的现实因素,但在以脸书改名为标志和高潮的当下这股元宇宙热潮里,资本打造新聚宝盆的急迫气息是显而易见的,甚至直接可以说是一场由商业资本话语推起波澜的“数字社会大跃进”(相较之下,主流政治话语对此是审慎冷静的)。元宇宙会在一夜之间走进千家万户,这是资本刻意营造的一个虚假繁荣或炒作假象。因为在底层技术上,无论是虚拟现实技术还是5G通信的渗透率,都远远无法实现对人类世界的全面虚拟化。可以说,元宇宙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是媒介演化和数字化社会深入发展的真实远景,但目前距离行业成熟的地步还有遥远的距离,带有明显的概念炒作和资本“催熟”的印记。

另一方面,元宇宙的眼花缭乱背后,貌似全球商业科技资本信心满满、意气风发,其实仍然有肉眼可见的由于科技停滞(相当长历史时段以来,人类在材料学、基因研究、可控核聚变等关键领域陷入长期停顿,有人称之为“大科技停滞时代”)带来的资本内卷的焦虑。“元宇宙”的科技噱头尽管“前卫”,但无论在网络和算力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区块链技术还是显示技术上都缺乏实质创新,而只是一个巨大的乏善可陈的综合。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全球科技陷入内卷、底层创新陷入停顿,所以资本才只能尝试以新的综合的方式打开其开疆拓土的“新殖民”的闸门。

从历史视野看,从西进运动对地理疆界的开拓到以殖民、军事、贸易手段对新边疆的拓展和维系,再到对技术疆界的开疆拓土,一旦这种拓

展新疆界的熵减运动停止,美国的民主政治就失灵了,其就面临岌岌可危、摇摇欲坠的危局。这是今天我们面临的世界历史变局的隐含线索。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扎克伯格的“元宇宙”还是马斯克的“火星殖民”,其实是同一种压力和焦虑之下的同一个逻辑的尝试。正因为如此,美国学者吉尔·莱波尔才明确指出:“世界上的科技亿万富翁们正在打造一种新的资本主义:马斯克主义。喜欢挖苦竞争对手的马斯克嘲笑了扎克伯格的元宇宙。但是从火星、月球到元宇宙,都是马斯克主义:极端的、外星的资本主义……”^[36]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也指出“马斯克主义”“把星辰大海和元宇宙一起锚定为当代资本主义新形态”,“无论向外太空的扩张还是向元宇宙的拓展,还是处在资本自我实现的延长线上”,^[37]其实都是资本翻手覆掌间的一码事。而这恐怕是站在技术主义立场上厚此薄彼的刘慈欣所看不到的。

就资本的现实层面总结而言:自我增值的强烈需要、避免社会危机的强烈需要,让元宇宙这个貌似能开启全新社会想象的大风口成为资本逃避内卷的长期共同选择。

在资本的未来秩序构建层面,作为元宇宙底层逻辑的资本扩张是极具创生、统合新文明秩序的思虑自觉的。如有人一针见血指出的:“从元宇宙底层逻辑上来看,扎克伯格将脸书更名为‘Meta’的真正意图,在于表明重组世界新秩序的21世纪资本愿景:如何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塑造一个由数字资本主义所引领的新型世界秩序。”^[38]

区别于比特币和区块链那种基于对中心化机制和政府的不信任生发的右翼无政府主义的尝试,在元宇宙的文明秩序构想里从一开始就有科技巨头和资本精英对于新社会形态和权力形态的顶层统揽设计,我们可以称之为“宇宙资本主义”。

这个命名近似于对美国政治学者乔迪·迪恩提出的“传播资本主义”(Communicative Capi-

talism)^[39]在“元宇宙”时代的合理扩展,并将之推向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极致。

在乔迪·迪恩看来,当今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一个方面,是从一种生产性的资本主义,演变成了一种传播性的资本主义。其商业逻辑是:借助不断更迭的媒介技术手段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播出现爆炸式增长,使得资本主义发现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可以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作为资本增值的手段。而随着媒体把几乎所有用户都囊括进生产体制之中,传播资本主义甚至成了一种统合性的“全能”的资本主义样态:它既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形态,又是资本主义的民主形态,同时还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之所以说元宇宙创生的文明秩序(“宇宙资本主义”)是把“传播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形态推向极致,关键在于“元宇宙”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统合性或闭合性——如《地球上最大的专制“国度”》一文作者在开篇对扎克伯格提出的“元宇宙”战略的意味深长的类比:“1947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在《大西洋月刊》上撰文,提议建立一个单一的世界政府,以保护人类免受原子弹的威胁。很明显,他的乌托邦想法没有站稳脚跟,但今天,另一位有远见的人正在建造一个宇宙主义的模拟物”^[40]——实现了对哈特和奈格里所言的人类非物质和生命政治生产的最大限度的含括。

这意味着,人类在元宇宙中的所思所想和行为作为数据生产活动,全部成为对资本增值的“贡献”,同时,操控绝大多数人的思想和行为对于一小部分权力、资本和技术精英而言,成为现实的可能和诱惑;这也意味着资本之手最终筑出了一座密不透风的监狱:它不像福柯的全景敞视监狱那样还要动用杠杆实现“以小博大”,它借助AI、区块链和大数据实现的是全程全部全视野全生命的监视和操控。

刘慈欣在《时间移民》里以浮光掠影的文笔写道:“现在,无形世界已掌握了立法权,正在渐渐控制整个世界。”这显然勾勒出了他以直觉的

方式觉察到但却无力深刻把握的元宇宙问题在未来社会层面的重要维度甚至中心维度:政治。

于是,那个在阶级社会恒久盘桓的政治主题,虽然被元宇宙酷炫的自由话语和民主修辞(在扎克伯格那里,他一边葆有一种“对美国民主的持久性冷漠”,一边“一直试图让脸书用户把自己想象成民主的一部分”^[41])所遮掩,但却在从新媒体的封建主义(如吕新雨的批评:“平台商成为虚拟空间的大地主”^[42])到元宇宙“新封建主义”的理论推演里,以一种前所未有和触目惊心的方式出现在人们眼前。

事实上,在“元宇宙”这一“由数字资本主义所引领的新型世界秩序”的生发和构建中,政治维度的考量和批判,不仅不是无中生有、无关紧要,反而是不可或缺和切中要害的。“元宇宙当中的权力到底会不会创造新的政治生活和政治秩序,以及元宇宙当中的阶级问题,元宇宙是更加不平等还是一个更加平等的世界”等“新政治秩序”的问题是这种考量和批判的重要部分,正如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熊易寒教授指出的:

元宇宙中的算力不平等可能将带来新的政治问题,对穷人来说,资源稀缺性的问题是常在的,对富人来说,元宇宙既满足了其情感上和体验层面的需求,又为其谋得了新的投资机会。资本在现实世界是不自由的,其流动是受到限制的,资本也试图摆脱权利管制,因此,元宇宙是否在让资本更自由,还是更加接近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理想,又或是让富人赢两次?……怎样平衡元宇宙对现实的超越和复刻,从而开启新的政治,形成新的政治秩序,这才是建构元宇宙世界的真正核心。^[43]

熊易寒教授谈到了“元宇宙中的元规则确立问题”,笔者认为其关键仍然在于马克思主义那个“陈旧”主题在元宇宙构想里的复奏:即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问题(或者用中庸的表达:资本和劳动的平衡问题)。换算成史观问题就是元宇宙时代的人民史观与精英史观的问题。内部肌理

的悖反性在于元宇宙以一种闪着金光的“共同体”叙事遮掩了闪着凛冽寒光的对普通人的摒弃和排斥。

在吉尔·莱波尔立足西方文学脉络对元宇宙的批评中,讲到在科幻大师厄休拉·K·勒古恩看来,曾经所有小说的主题都是“普通、谦逊、有缺陷的人”(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称她为“布朗夫人”),而当世的科幻小说却丧失了这一立场:

这样的科幻小说似乎“永远被困在我们闪闪发光的伟大宇宙飞船中,飞越银河系”,她形容这些飞船“能够容纳穿着黑色和银色制服的英勇船长”并且“能够用摧毁世界、屠戮众生的射线枪将其他敌对的船只炸成碎片,并将大量殖民者从地球带到未知世界”,而且最终“飞船无所不能,绝对什么都做得出来,除了一件事:他们容不下一个布朗夫人。”^[44]

由是,吉尔·莱波尔对元宇宙的未来文明秩序,作出了在笔者看来或许是最为鞭辟入里的惊悚评论:“马斯克主义和元宇宙所设想的未来——由技术亿万富翁建造的真实和虚拟世界——也不包含布朗夫人。……他们甚至无法想象她。”^[45]

在这个意义上,元宇宙这场带有显著资本主导、权力重塑特征的科技整合和数字社会跃进,背后的公共性是个极大的问题。这是一个公共性完全成疑的元宇宙帝国:在这个由资本执牛耳的宇宙设想里不仅有对老年人口、农村人口、边缘人群、底层人群的抛离使之成为废弃数据、冗余字节的问题,而且即使对位居中心的青年人口——联想到此前随着EDG的夺冠众多“一般学校”“边缘大学”里的孩子们的忘乎所以和过激举动——都磨刀霍霍……

无法想象“布朗夫人”存在的元宇宙文明,意味着它无法给绝大多数的人民(劳动者)一个光明的未来许诺。“资本专权”“新封建主义”“中世纪黑暗宗教”(“借助信息技术的幻象,邪恶的犹太企业家与其背后的资本国际在互联网世

界复活了中世纪的黑暗宗教,扎克伯格也成为主宰这个信息宇宙的首席撒旦^[46])“永远受资本奴役的、一盘散沙的布朗式奴隶制社会”^[47]……所有这些或许带有夸大色彩的残酷指称,都是对以自由民主为修辞的“元宇宙”文明丧失公共性的反民主指控。

至此,对于元宇宙的“自由—奴役”悖论的讨论已经在宏观的社会民主政治批评的层面有了赤裸裸的展现。但问题的深刻性还在于,“元宇宙”创生的“叙事革命”“改变了现实生活以丛林规则为第一逻辑的状况,成为‘非社会的社会’”——“它更巧妙地掩盖了市场垄断、利润剥夺和价值操控的存在,人们不必用‘规训或惩罚’的条令来管理自己,而可用‘平等和自由’来放松自己。在这里,元宇宙轻轻松松地实现了人们的‘平等感’‘自由感’,并用这种‘感知性存在’,取代社会平等和政治自由本身。”^[48]

最吊诡的一幕出现了:在元宇宙这样一个极端需要民主政治质疑和追问的文明或社会里,“政治”和“社会”本身却被取消了(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吴冠军教授从政治哲学角度分析游戏和电影时指出的“元宇宙电影中最关键的,是拿掉了选择自由,在展现了无穷多的可能性以后,反抗消失,所有根基被消灭”,^[49]即与此相关)。资本—技术的统治艺术达到“物我两忘”的巅峰,它的基础是对于人的主体性的完美拿捏、彻底俘获与隐秘改造。

元宇宙的“毒品”“致幻”机制,是其巨大诱惑力和俘获力的外显形式,这一点在刘慈欣科幻小说和其他相关论述里均已有所提示。这是一种有如“病毒”一般防不胜防的物欲诱惑,正如有人在评价元宇宙电影时指出的:“尼尔·斯蒂芬森所描绘的‘雪崩’病毒,在现实生活中正是商业社会所塑造的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物欲诱惑,名车豪宅,奢华生活,混乱的两性关系,甚至是大麻与毒品。这种现实的物欲投射到虚拟的网络世界,成就了‘元宇宙’的商业图景。”^[50]在元宇宙商业图景奠基于对人性、对主体性的俘获

的意义上,“元宇宙就在我们心中”确实是个有着实质内涵的有意义判断。

在外显形式之外,这套文明秩序的逻辑根基,是内化了技术的算法算力优势的资本,作为异己的力量与主体的高度媾和,使得主体被彻底捕获为一种丧失自由意志的资本—技术专制体制的附庸。之所以会出现前述的元宇宙文明中的“政治”和“社会”本身被取消的“最吊诡一幕”,主体性层面的因素在于:在古代奴隶制、中世纪农奴制和近代雇佣劳动制这些阶级社会文明时代三大奴役形式之后,元宇宙文明中出现了“自主奴役”的极致吊诡(在最深刻的层面,刘慈欣等科幻作家对于元宇宙的愤怒和无力,人文根源就在于此)。

借助“元宇宙”“非社会的社会”之经济、政治和文化构建,基于对人类非物质和生命政治生产的全面囊括,资本—技术仿佛要实现自身统治的无孔不入、无远弗届和千秋万代。但恰是在此时,恰是在此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马克思主义“命运交响曲”也“不合时宜”地于我们耳畔奏响。这样讲的政治逻辑是:吕新雨教授在评论新媒体时代的劳动者悖论时指出的人的彻底数据化意味着人类自身的“无产阶级化”“获得前所未有的推进”^[51]这一命题本身在元宇宙时代也“获得前所未有的推进”,因为元宇宙时代人的生命过程本身都成为自我出卖的过程,人的整个生命都成为元宇宙时代剩余价值的来源。而就像《头号玩家》等反乌托邦的元宇宙电影浓墨重彩地呈现了某种激烈斗争的存在一样,沿着“自由—奴役”悖论在未来现实中展开的人的“无产阶级化”走向极致,与之相伴随的是最终不堪忍受资本操控和掠夺的“底层玩家”与“布朗夫人”们的蠢蠢欲动,是“阶级斗争”的不安魅影在被放逐的文明边缘徘徊、游荡……

四、结语:“元宇宙”的三个“模型”与三种前途

刘慈欣跨越三十多年的对于元宇宙的前瞻架构和省思固然精彩,《雪崩》《盗梦空间》《头号

玩家》等西方文学影视作品对于虚拟世界的描绘固然惊心动魄,但笔者在中文世界里读到的最摄人心魄的元宇宙模型,是文化研究学者周志强 quoting 沉出的列子所讲“昼夜各分”的故事:

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弥勤。昼则呼而即事,夜则昏惫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梦为国君。居人民之上,总一国之事。游燕宫观,恣意所欲,其乐无比。觉则复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昼夜各分。吾昼为仆虏,苦则苦矣;夜为人君,其乐无比。何所怨哉?”(《列子·周穆王》)^[52]

这几乎就是两千年前早已写就的“元宇宙”脚本,是老役夫在梦境中打造的获得即时满足的“平行世界”,像《头号玩家》里那个分裂于混乱崩溃的现实世界与流光溢彩的游戏宇宙中的男主角一样,老役夫为自己打造的“元宇宙”也是使自己在荒芜潦倒的现实中获得救赎的“绿洲”。

把老役夫的个体救赎放大到社会规模,指向的就是元宇宙叙事的昭然若揭的前途:社会性的梦境大生产,集体醉生梦死的快感实现技术形式。在其中,资本通过俘获欲望,得到主体的臣服,实现与玩家主体的亲密无间。

这是自电报的诞生开启的电子极乐世界的终成正果。但在这个遵循“快乐的效率”逻辑,由资本—科技联手打造的幻梦空间里,沉溺在多巴胺的释放里不能自拔的“玩家”们在包裹整个生命的幻想性满足里却始终处于不自由不发展的境地,由此引发刘慈欣们的忧思:永生就是永死,天堂就是地狱,文明戛然终止……

由是,笔者联想到《维摩诘经》中在娑婆世界与众香世界之间“元宇宙”式的“全息传送”和自由穿梭:

时化菩萨,既受钵饭,与彼九百万菩萨俱,承佛威神,及维摩诘力,于彼世界,忽然不现,须臾之间,至维摩诘舍。时维摩诘,即化作九百万师子之座,严好如前,诸菩萨皆坐其上。是化菩萨,以满钵香饭与维摩诘,饭香普熏毗耶离城,及三千大千世界。时毗耶离婆

罗门、居士等,闻是香气,身意快然,叹未曾有。(《维摩诘经·香积佛品第十》)

在这个元宇宙“模型”当中,与资本蓄势收割和统治心智的企图完全不同,一切的出发点都在于以外在手段引导人的内在觉醒和不断提升;维摩诘式的“元宇宙”不是像扎克伯格式的“元宇宙”那样,要披着自由的旗袍把人变成一团“欲望的影子”,通过情绪实验和大数据方式,使人限于永恒的物欲囚禁当中,造成的主体塑造的后果便是:“被物欲主导的人,再也不是有着独立人格,致力同于大道,共建文明秩序的人。”^[53]——而是始终致力于引导人格的完善和道德境界的提升。抛开其中的宗教、神话色彩,在未来,借助元宇宙的技术手段,通过对全新的教育资源挖掘、呈现和互动实现方式的打造,帮助人类建设更有意义的教育和实现更有意义的生活,这难道不是元宇宙应该朝向的一个“叹未曾有”的前途吗?

尽管笔者对于在实质上排斥公共性的作为资本叙事的元宇宙的批判十分严厉,对于这种将所有生命活动都纳入资本罗网和资本节律中的“宇宙主义”新政治经济构建充满忧思,但这都不意味着笔者对“元宇宙”构想中所可能包含的民主潜能和新文明潜质的漠视:作为理想的连接方式,它本可以成为打造更活跃更民主更具包容性的数字社会共同体的基础,从而前所未有地引领人类摆脱各种异化状态与现实钳制,接近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真正共同体”与“自由王国”。

现实的考量是:元宇宙的建设不能成为资本与市场恣睢的拓荒领地,这意味着国家作为一种调节市场的公共性制度的位置不可或缺,应将元宇宙的资本叙事所始终试图超越的国家公共性力量予以保留和进一步发挥,如同法学家冯象在评价人工智能发展时不容置喙地指出的:“推翻数据寡头对 AI 经济的垄断,建设人机大同的未来,首先一条,要有不受资本控制的国家机器。”^[54]而更具根本决定性的则仍在于民众的觉

醒和辨明是非,民众在主体性层面对于“天堂与地狱的合一,永生与永死的翻转,自由与奴役的辩证”等元宇宙悖论性特质的深刻警醒,对于“宇宙资本主义”的新霸权形态的深刻批判……须知自主奴役的荒谬处境不可能导向自由王国里的真正翱翔。

在这个意义上,最后我们来重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那段脍炙人口的话,并将之作为超脱于现实的物质力量,摆脱劳动实践的现实藩篱,使人得以在各种空间和角色中自由转换的“元宇宙”的一个场景和“模型”: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会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中的主要因素之一。^[55]

相比于在资本营造的温柔乡里忘死缠绵的爱丽舍乐园和电子极乐世界,这样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版本的“元宇宙”不是更值得期许的人类未来吗?

注释:

[1][18][19][21][29][30][37][43][49]韩超、解仲慧:《“元宇宙”是文明的新生,还是话语的狂欢?——“认识元宇宙:文化、社会与人类的未来”学术论坛》,文艺理论研究杂志公众号,2022年2月13日。

[2][9]冰川思想库:《元宇宙是一个骗局?今天的元宇宙,就是上世纪末的互联网》,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526083815_405849。

[3]胡疆锋、刘佳:《2021网络文艺:在塞壬的歌声里踏浪而行》,《中国文艺评论》2022年第2期。

[4]钟艺志:《文艺把元宇宙“接回家”》,《中国艺术报》2022年3月9日。

[5]殷晓蓉:《关于电报的传播学意义——一种基于媒介技

术与文化内涵的思考》,《新闻大学》2011年第1期。

[6][美]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何道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131页。

[7]吕新雨、赵月枝、吴畅畅等:《生存,还是毁灭——“人工智能时代数字化生存与人类传播的未来”圆桌对话》,《新闻记者》2018年第6期。

[8]袁勇、王飞跃:《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与展望》,《自动化学报》2016年第4期。

[10][11][23][48][52]周志强:《元宇宙、叙事革命与“某物”的创生》,《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12期。

[12][法]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宣言》,黄春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5页。

[13]强世功:《陆地、海洋与文明秩序》,《读书》2019年第5期。

[14][35][斯洛文尼亚]齐泽克:《“元宇宙”是企业新封建主义的幻象》,思想火炬公众号,2022年2月26日。

[15][16][17][24]《盘点 Facebook“七宗罪”:元宇宙只是一块“遮盖布”?》,雷锋网,https://www.leiphone.com/category/industrynews/40AzWsNW0BGIAyVt.html。

[20][38]陈亦水:《从反乌托邦到后乌托邦:元宇宙艺术及其数字资本的底层逻辑》,《中国艺术报》2022年3月9日。

[22][36][44][45][美]吉尔·莱波尔:《马斯克主义:科技亿万富翁们的外星资本主义》,时文精选公众号,2021年11月6日。

[25][26][瑞典]福克斯、[加]莫斯可:《马克思归来》,“传播驿站”工作坊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66页。

[27][28][40][41]《突然改名“元宇宙”,扎克伯格的野心被大西洋月刊一语道破》,文化纵横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4959951589871108&wfr=spider&for=pc。

[31][32][加]达拉斯·斯迈思:《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王洪译,《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

[33][46][47][50][53]博索:《元宇宙,幻境的烟火》,新浪网,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714283429921122&sudaref=www.baidu.com。

[34]胡延平:《元宇宙是一场技术没有准备好的迫不及待的革命》,新浪网,https://cj.sina.com.cn/articles/view/6311913111/17838269702001a9tz。

[39][美]朱迪·迪恩:《传播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的局限》,李明阳译,《全球传媒学刊》2015年第2期。

[42][51]吕新雨:《新媒体并没有创造出什么新的东西》,文化纵横公众号,2016年10月17日。

[54]冯象:《我是阿尔法——论人机伦理》,《文化纵横》2017年第6期。

[5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5页。

【责任编辑:刘 鏊】